



方卫平

为童年守护 一片阔大的园地

□方卫平/口述 赵淑萍/整理

他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守望者与拓荒人。四十余年来,他以学者的沉潜与批评家的锐利,深耕这片学术沃土。从基础理论的本体追问,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法国儿童文学史论》的历史建构,再到《白乌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的中国发声与十卷本《方卫平学术文存》的学术积淀,他始终以坦诚、峻切、不加粉饰的批评精神,守护着儿童文学的尊严与思想高度。

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主任方卫平教授。他以一生的学术行旅,让世界看见中国童书,也为后来者照亮通往童年与文学的道路。



学人道路,在烛光下定志

1982年初,我从宁波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镇海骆驼中学任教。那年春天,大学同窗周耀明前来探望,老友重逢,促膝长谈,直到东方既白。他当时在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领域已有深入研究,正是在那场彻夜长谈中,他建议我将学术目光投向儿童文学。这次谈话于我而言,犹如拨云见日——本科时期培养起来的理论兴趣,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而充满生命力的着力点。1984年,我报考了儿童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踏上了这条探索之路。

我的专业工作,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史的建构,二是当代儿童文学现场的观察与批评。借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我试图阐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的艺术特征,旋即又意识到儿童文学乃是成人与童年的艺术对话,于是从创作与接受的融合立场重新审视其本体。1993年,我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法国儿童文学史论》《儿童文学教程》等著作,试图在中外比较与理论建构中,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更大的学术空间。而在当代批评领域,我坚持“细读”的重要性。理论若脱离了文本,便容易沦为凌空蹈虚的玄谈。多年来,我坚持对具体作品进行细致的剖析和赏读,从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到各类读本选文的品赏文字,我

力求在理论与批评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我常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忧思:繁荣的表象之下,常识在缺失,价值观时有迷误,文学性的垮塌令人心惊。我所愿坚守的,是一种坦诚的、不事包装的批评精神。

近年来,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方卫平学术文存》,算是我40年学术探索的一个阶段性的注脚。

儿童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若要真正立得住,必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与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合作近二十年。2008年秋,我受邀承担《白乌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中国书目的遴选与点评工作。彼时,该选目收录的中国童书寥若晨星。我与赵霞教授遂开始系统搜罗、品评国内童书新作,18年间推荐了90种中文原创作品,涵盖儿童小说、图画书、童话、儿童诗、儿童散文诸门类。2011年,我应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担任“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主编。这一项目获得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的官方授权。201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上,慕尼黑馆特为此邀请我们举办了关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专题对谈,以此向当年书展主宾国中国致敬。来自各国的八十多位同行到场参与,包括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馆长等。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见中国儿童文学的真实面貌。



研究中心,在批评中守护

2023年8月,依托浙江文学馆,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与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受命担任主任。自2008年起,我曾组织过30场“儿童文学新作系列研讨会”,张之路先生说那些研讨带着“一股锐气,一种青春的凌厉之风”,张炜先生则说我们的研讨会会有话直说。如今,我把这份“有话直说”的传统搬到了浙江文学馆。

研究中心次第铺开了一系列活动:第一场即是宁波作家吴洲星《紫云英合唱团》新书研讨会,接着是探讨边界拓展的“儿童文学:新的可能性”跨界写作对话会等,还曾邀请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桑德斯先生远道而来,与我们共话非虚

构文学的伦理与批判性参与。我们还常组织“出版前置研讨”——在作品出版前便展开深度切磋对话,还邀请小学生参与研讨,冯与蓝的《万里漂流瓶》,慈琪的《十个十》等,现场深入真诚,机锋四出而又融洽和谐。

我始终觉得,研讨不是做给人看的包装,而是坦诚的碰撞。我主张不仅要听专家高论,更得俯下身,听听孩子们怎么说——毕竟,作品好不好,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也有发言权。中心想做的,就是搭建一座桥,连接创作与批评、童年与成人、学院与现场、中国与世界,在童年日益复杂的现实面前,替文学守住一点该有的深度与温度,也为童年争取更为阔大的思想园地。

学术梦想,从甬江畔起航

我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精神滋养下度过的。那时候,书籍稀缺,我们对每一本到手的读物都倍加珍视。如今,我的书柜里仍珍藏着《闪闪的红星》《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等儿童小说。它们是我童年最亲密的伙伴。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邻居杨姓同学的父亲借走了《闪闪的红星》,归还时满脸喜悦地说:“这书我读了两遍!”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大人也爱读儿童的书!

我与弟弟曾拥有三四百册连环画,其中有《小燕子飞》《智取威虎山》《二十响的驳壳枪》等。我们常常在通往学校的乡村供销社柜台前,瞪大眼睛等待新到的小人书。那一刻,童年的乐趣和精神底色便悄然铺展开来。

1977年初夏,我即将从镇海的浙江炼油厂子弟学校高中毕业,与几位要好的同学鬼鬼祟祟地讨论起“去哪里插队落户”这类话题。不久,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我10月份开始准备,11月份参加初试,12月份参加复试。转年,收到入学通知书,进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即后来的宁波师范学院(现并入宁波大学)读中文本科专业。

学校坐落于甬江畔的三官堂,校园简陋,只有低矮的平房,却遇见了毕生难忘的师长。大学一年级,徐季子、李燃青老师主讲文艺理论。徐老师授课思路开阔、大气磅礴,李老师则学理严

谨、绵密入微,两位老师的风采让我陶醉。那门课我考了较高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误认”——我或许真有从事文学理论思考的禀赋。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浸淫于美学、哲学与心理学著作的阅读,文艺学成为我专业方向的锚点。大学四年间,我悄悄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学术练笔,如《柏拉图文艺观点刍议》《试论美的本质》等,并曾将第一篇万余字的“论文”《创作方法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取消》硬着头皮拿给陈象成、李燃青、徐季子诸师看。老师们鼓励有加。可以说,我的学术梦想,正是从这座甬江畔简陋的校园里起航的。

大学生生活绚丽多彩,那些与文学同频共振的瞬间尤其令人难忘。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定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小组的同学群情激昂,唇枪舌剑,集体推荐了30篇作品。结果揭晓,25篇获奖篇目中我们中了17篇。虽说不过是普通群众投票者,却如自己中奖一样欣喜万分。正是这份对文学的自觉参与与由衷热爱,让我们在经典作品的滋养中,悄然完成了精神的成长。

时光荏苒,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我亦编选了数十套儿童文学选本,在业界幸得几分认可。这份甄别的目的,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数十年间沉潜于文学作品、反复研磨所积淀下来的。



方卫平的部分著作。